

Reconsidering Utop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affective Schema

ZHENG Yihan¹ ZHU Yushuang²

¹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²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ne 6, 2022

Accepted: September 6,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Yihan & ZHU Yushuang. (2022). Reconsidering Utop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affective Schem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45–05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7](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7). p 0204.00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7>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Reconsidering Utop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affective Schema” is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of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ostalgic Narration in the Works of Edith Wharton and Eileen Ch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hema” sponsored by the Planning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of Utopia make it a disputed concept in the academic field, resulting in an increasing need to redefin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schematic theory, Utopia could be defined as an adaptive mechanism triggered by the lack of sense of security. Such a mechanism is in effect a cognitive-affective schema within which the individual could construct idealized time-space, social relations, identity and alternative values. Through such a cognitive-affective schema, the individual could find it possible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happiness pursuit and even social reformation.

Keywords: Utopia; schema; cognition; idealiz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Zheng Yihan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Brit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Zhu Yushuang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重審烏托邦

——基於認知情感圖式理論

鄭憶寒¹ 朱好雙²

¹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²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烏托邦現象的複雜性與含混性使得烏托邦這一概念在學界一直存有爭議，重新定義烏托邦的呼聲越來越大。借助認知學的圖式理論構建一個烏托邦圖式模型，有助於深化現有認知。在認知圖式視角下，烏托邦可以被理解為由於個體缺乏安全感而引起的自適應系統。個體憑藉疏離與理想化的策略，在遠離現實的時空建構一個理想化客體以及客體中有序的社會關係，由此滿足對另類主體身份以及價值理念的需求，達到調節情緒、增加幸福感、促進社會改變的功效。

關鍵詞：烏托邦；圖式；認知；理想化

基金專案：安徽省社科基金專案「認知圖式視域下伊迪斯·華頓與張愛玲小說中的懷舊書寫比較研究」(AHSKQ2021D112)。

引言

烏托邦(Utopia)由兩個希臘詞根 topos 與 u 構成，前者意味著地方，後者作為雙關語既有「美好」又有「不存在」之意，合成之後意為「不存在的美好之地」。它通常指一個美好但並不存在的不可能社會或者國家，是文學作品中的主題之一。西元前 8 世紀，詩人赫西爾德(Hesiod)在《工作與時日》中描寫了像神一樣生活的黃金時代的人，他們「內心無憂無慮，沒有絲毫憂愁」(1991: 70-72)，此乃烏托邦首次出現於文學領域。而流傳於 14 世紀的英國民謠《科凱恩之地》，則描繪了一個位於西班牙以西，充滿歡樂、友誼的富足島嶼，成為烏托邦在西方民間文學的較早力證。1516 年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著作《烏托邦》中正式提出烏托邦這一術語，用它來描述一個虛構的理想國家——它沒有戰爭，沒有階級分化，沒有貧富差距，沒有時代的混亂狀況，人們的生活協調、美滿且快樂。在中國，先秦時期的「樂土樂國」、「小國寡民」；魏晉時期的「華胥國」、「桃花源」；唐宋時期的「醉鄉」、「睡鄉」、「君子鄉」，無不證明烏托邦早已有跡可循。

可以看到，烏托邦的關注點隨著時代變化一直在變化。文藝復興以前尋找建立人類應該在生活中追求的目標，文藝復興之後堅持追求這些目標的理所應當性，到了現當代則強調探尋如何拓寬人類的活動範圍。烏托邦關注點的不斷變化一方面伴隨著其內容的不斷豐富，既涵蓋著政權組織、財產分配、婚姻關係等不同方面；另一方面，也見證著圍繞著烏托邦的爭議愈發激烈。一直以來，烏托邦被視為一種思想、一種制度、一種文學體裁而引起廣泛討論。政治學常常關注於政治實踐方面，認為極權主義、共產主義便是烏托邦；社會學關注於人際關係，認為公社、共同體就是烏托邦；心理學則將其視為欲望的投射，一種回到子宮的衝動(Frank E. Manuel and Fritzie P. Manuel 1979:27)。如此非明確定義地使用烏托邦，使烏托邦已然成為一個符碼詞(code word)，代替烏托邦者想要的任何東西。對此，研究烏托邦的權威專家魯斯·列維塔斯(Ruth

Levitas)也不得不指出,「我們需要一個定義,藉以包容採用不同形式、發揮不同功能的烏托邦」(1990:209)。

隨著跨學科的興起與認知學轉向,烏托邦的「再理論化」出現了新的契機。以提蘇爾(Reuven Tsur)、霍根(Patrick Hogan)以及詹賽恩(Lisa Zunshine)為首的認知學學者推動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交叉研究,為文學及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其中,認知情感圖式作為認知學與心理學交叉的產物,是實踐之一,並具有為文學內涵批評提供理論框架的潛質。狄克森(Thomas Homer-Dixon)與薩加德(Paul Thagard)均認為,特定意識形態是特定認知情感圖式的產物,是後者的概念化表徵。有學者將認知圖式與懷舊理論相結合,成功對懷舊這一現象進行了重新闡釋,本文將沿襲這一路徑,同樣以認知圖式理論為視角,在對既有烏托邦研究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嘗試對烏托邦進行再闡釋,以期為烏托邦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可能。

一、烏托邦的概念變遷、源起及功能

雖然烏托邦現象源遠流長,但它作為學術領域研究在20世紀初期才出現。於1941年出版的《英國文學中的烏托邦》由法國學者杜邦(Dupont Victor)所寫,是當時研究英國烏托邦中最具代表性的書,然而此書出版以後反響甚微,甚至沒有英文翻譯版本。50年代,莫頓(Morton Arthur Leslie)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視角探討了英國的烏托邦現象,格貝(Richard Gerber)以19世紀晚期文學作品為藍本探討了現代烏托邦,二者的研究使烏托邦引起了學界注意。隨著60-90年代諸如戴維斯(James Colin Davis)、薩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庫瑪(Krishan Kumar)、布洛赫(Ernst Bloch)等大批學者相關烏托邦的著作問世,烏托邦研究大放異彩。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從多個學科多重角度對其進行考察,但結果莫衷一是。

(一) 烏托邦的概念變遷

烏托邦到底是什麼?當我們談及烏托邦主義以及烏托邦思想時,我們在指什麼?對烏托邦的定義一直是個爭議,赫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與曼海姆(Karl Mannheim)認為,烏托邦是一種「思想」,前者根據其功能明確將烏托邦具化為「依靠某種思想或理想本身或使之體現在一定的社會改革機構中以進行社會改革的思想」(1990:4);後者則從形式出發,將烏托邦界定為「與現實狀態不一致的思想狀態」(2002:196)。薩金特則指出,烏托邦是一種「表達形式」,表達著超越性的社會夢想(1988:xiii)。戴維斯認為,烏托邦是一種「構想」,它在頭腦中精心組織,能夠解決集體問題,並尋求設計出一套政治和社會制度來解決這些由集體問題引發的利益衝突和潛在的社會失序(1981:38)。布洛赫從烏托邦的實現路徑出發,將烏托邦理解為一種「革命行為」(2013:15),旨在顛覆不合理的現存社會。

眾說紛紜的定義如薩金特所說,「適用於各自研究的領域,但不具有相容性」(1994:15)。在《烏托邦的概念》一書中,列維塔斯整理了來自文學和社會理論的豐富材料,對烏托邦的概念含義與意義做了一個系統梳理。此外,他將烏托邦置於現代話語的語境內,檢視了許多論述現代性的思想領袖對烏托邦概念的運用,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曼海姆、歐文、布洛克、莫裏森與馬爾庫塞等,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烏托邦「至今仍是想像和生產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最有利的世俗性概念[……]是在文本和政治實踐中對更好生活方式的欲求的一種表達,是文化和政治中一種積極的元素」(2018:291)。然而,面對烏托邦的繁雜以及學界基於內容、形式或者功能對烏托邦的多元化定義,列維塔斯最後也不得不指出,未來我們需要將烏托邦「再理論化」(265)。

(二) 烏托邦的源起

儘管烏托邦的定義眾生紛紜,但對其因何而生,學界卻有著普遍共識。學者們常用「不滿」(discontent)



情感作為觸發烏托邦的關鍵因素,如考夫曼(Moritz Kaufmann)將烏托邦視為「民眾不滿的表達,是社會紊亂,更是社會病理的產物」(1977:3),赫茨勒認為烏托邦源於「對社會絕望情緒的一種精神抗拒」(1990:267);曼紐爾、列維塔斯等紛紛認同,烏托邦源於一種不滿情感。它是一種從業已存在、給定社會秩序的觀點出發,形成的原則上在當下無法實現的理想,折射出的是烏托邦者在現實處境中的不滿情感。

然而,作為有思考能力和趨利避害本能的高級生物,人類常常會在現實中受挫時通過幻想來緩解自身的不滿情感。這是否意味著,所有因不滿情感而起的,追求美好的個人幻想都能夠被視為烏托邦?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於,對於很多人來說,這種幻想不過是感性的天馬行空,與現實過於遙遠,並不具有實踐性。只有對於一小部分人來說,他們能夠運用理性機制,使幻想逐步發展為一種理性的認知,並借助它調節情感,把握對世界的感知,並協調他們的現實活動。正如曼海姆所說,「我們不能把所有不符合或者脫離現實的思想都說成是烏托邦式的,只有那些超越現實的取向才會被我們說成是烏托邦式的」(2002:235),只有在某些群體把這些幻想納入他們的實際行動並力圖使之成為現實的時候,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才變成烏托邦式的。

(三) 烏托邦的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烏托邦具有功能性這一點上,學者們也不謀而合。王爾德(Oscar Wilde)曾說,「一幅不包括烏托邦在內的世界地圖根本就不值得一瞧[……]所謂進步,就是去實現烏托邦」(2004:240);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說,「烏托邦是一切進步的本源,是進入未來社會的指南」(qtd. in Bauman 2017:97)。文學家、評論家乃至哲學家們,無論是作為倫理-宗教性的早期烏托邦先知者,還是空想社會主義者,亦或近現代理想社會的改革者,皆強調了烏托邦所具有的功能性。

既作為欲望的投射,也作為逃離現實的手段,烏托邦首先具有補償功能。用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話說,烏托邦作為一個理念世界,其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或補償」(6)。當殘酷的當下現實讓人無法面對,烏托邦想像無疑成為逃離現實的避難所。借助想像,個體能夠將現實世界的種種因素進行篩選和加工,形成新的「現實」並投射到想像世界。這種想像因疏離當下而有效緩解了個體強烈的不滿情感,又因融入了超越現實的欲望,補償了個體在現實中匱乏的滿足感與安全感,使人「產生一種慰藉(solace),支撐人們在苦難中頑強生存」(列維塔斯 176)。儘管這種帶來補償性的烏托邦因其逃避現實的成分而被喻為「空中樓閣」,但仍無法否認它給個體認知情感帶來積極影響的功能性。此外,烏托邦還存在著改變外在世界的功能。誠如列維塔斯所說,烏托邦的想像性質中有著激進的社會改革的力量,因而它實則存在著「補償、批判、以及改變」(175)這三大功能。對於烏托邦的批判和改變功能,赫茨勒做出了更充分的解釋。他指出烏托邦理想雖然是個人內心的設想、回憶以及建設性幻想的混合物,但卻是當時的現實和早期的思想形成鮮明對比的結果;雖然出自聰敏過人且富有遠見的人物,卻也隱藏著擺脫哲學的犬儒主義精神與絕望情緒的社會情感。他說,「社會理想可以作為奮鬥的目標,控制和改造社會。烏托邦作為一種社會理想,是個人願望與社會現實相互作用並不斷協商,最終形成的集體願望,能夠推動著社會發展,引導人們向前」(1990:270)。它們賦予人們以希望並激發人們的勇氣,給生活帶來活力;它們間接啟發人們的思想,喚醒人們並導致行動。比如,著名的小溪農場,以及霍桑筆下《福穀傳奇》的原型布魯克農場,雖然最終都慘澹收場,但作為一種嘗試,在社會改造上都取得了里程碑般的效果。

在對烏托邦的概念變遷、源起與功能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烏托邦是一個混合了情感與認知的複雜現象,其涵蓋內容之廣、現實指涉性之靈活決定了烏托邦理論化的高難度性。列維塔斯在對烏托邦進行描述性、分析性與規範性總結時,感慨烏托邦的形式和功能「隨社會和文化語境而變化」(265),並指出應當在未來實現烏托邦的再理論化,以尋求一個能夠包容採用了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烏托邦定義(265),用薩金

特的話來說,需要一個「既能夠包容各種形式,又能夠劃清邊界的烏托邦」(1994: 15)。

二、重審烏托邦——作為一種認知情感圖式

毋庸置疑,烏托邦的深厚歷史和豐富多元性給相關研究帶來了巨大挑戰。然而,隨著學界認知學的轉向以及跨學科的興起,烏托邦研究迎來了新的契機。作為認知科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圖式在文學批評領域並不陌生。它指一種經過抽象或概括了的背景知識,是「人腦中的知識單位」(邵志芳、高旭辰 132),圖式一旦形成,人們會在它的影響下感知、評價客觀世界,並賦予自我與世界各種各樣的意義。自康德提出圖式^①這個概念以來,心理學便對其進行深入探討。巴特利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認為圖式是「對先前反應或經歷的一種積極組織」(1995: 32);皮亞傑(Jean Piaget)則指出「圖式是主體的認知結構,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基本模式」(1985:66)。貝克(Aaron Beck)等人發現,認知情感圖式作為圖式的一種,是與文學現象息息相關的蘊含著人類需求和社會經濟因素的特殊圖式。它由特定的人類需求、相應社會情境的認知片段、相應的基本價值信念和本能的防禦策略構成(2004:17-18)。在人類與環境的互動中,不斷演化生成,並調節人類的認知和行為模式。

重新審視烏托邦可以發現,一方面,烏托邦的情感驅動、疏離與理想化策略、補償與改變功能呈現出系統化特徵,與圖式概念不謀而合;另一方面,烏托邦中的認知活動又在建構主義之下,因此,從認知學圖式概念出發重新闡釋烏托邦,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性。已有學者嘗試將烏托邦理解為一個序列過程,為圖式理念闡釋提供了充分的基礎。比如,李小青認為,「烏托邦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代表的是人類追求理想、完美、自由境界的精神衝動,通過文本或其他載體加以想像性的體現,其目的是促使人們對所處現實社會以超越性的眼光做出清醒的評價和價值判斷,並給予相應的批判,以此促進人的生存狀態的改善或提升」(2010: 6)。對烏托邦源起、策略、目的、功能的序列性發現;加上前文對幻想與烏托邦的辨析,即,烏托邦之於幻想的區別在於它存在著系統、理性的認知加工,足以說明,烏托邦是具有圖式性、僅被某些人所有的動態的認知機制。既是作為一種圖式,那麼烏托邦與所有認知圖式一樣,包含著特定的需求、對社會的具體認知、嚮往的價值信念、應對策略以及目標導向。從圖式的系統性對烏托邦進行模型的抽象,可以大致分為動機模組、策略模組、建構模組以及功能模組,它們對應著烏托邦作為一種認知所包含的感知系統(接收資訊)、記憶系統(資訊編碼、貯存和提取)、控制系統(監督執行決定)以及反應系統(控制資訊輸出)。

(一) 動機模組

對動機模組的理解,是烏托邦研究的基礎所在。系統論提出,對於一個複雜系統來說,初始條件極其敏感——它的細微變化可能會引發系統在進行過程中的巨大改變(鄭春順 88),蝴蝶效應便是典型證明。由於過往研究並未將烏托邦視為一個複雜的自適應系統,所以大都籠統地將其歸因於糟糕的現實處境造成的不滿情感。然而,正如薩金特指出,「烏托邦不止出現於社會現實處境糟糕的狀態,當我們處於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狀態,我們也會有烏托邦想像」(1994: 3)。因此,想要對不滿情感追根溯源,有必要重新尋找烏托邦產生的獨特條件。

在這方面,芒福德的研究很具有啟發意義。芒福德從宏觀語境出發進行考察,認為烏托邦的直接原因在於不確定性,即安全感的缺失(5)。根據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歸屬感與安全感是人類的需求之一,當人們在現實中遭遇壓力時,會不可避免地採取一系列應對措施。芒福德指出,正是人類在精神世界中感受到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促使他們通過虛擬環境或者幻想來逃離現實、改變現實(6)。典型例證便是莫爾和他的《烏托邦》,莫爾在 1515 至 1516 年創作《烏托邦》時,生活舒適。彼時他身居要位、家庭美滿,並以倫敦



市一位行政司法長官的身份出使歐洲。然而當時宗教論戰已起,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成為「異教徒」對已有信仰的挑戰;國王與教皇關係也一度緊張,亨利八世與教皇意見相左,爭執不下,政權遭受動搖。這對於重視和諧而又嚴格的等級制度的莫爾來說,無疑成為了不安全感的來源。莫爾《烏托邦》的創造條件恰恰說明,不安全感才是烏托邦產生的根本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探討環境因素,芒福德也關注人的適應性因素。他指出,並非所有人在遭遇安全感缺失的問題時,都傾向於烏托邦機制,決定其中變數的關鍵因素是人格。面對無法適應的地區、社會秩序和人,三種類型的人有三種不同的反應:逃避、泰然自若、以及反擊(芒福德 8),其中,泰然自若與反擊的人分別由於適應力較強和行動力較強而不需要烏托邦,只有具有逃避傾向的人格才會選擇烏托邦的形式逃離現實。芒福德的這一觀點既在心理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實證研究中得到證實,也在心理學家霍妮(Karen Horney)的理論中找到依據。根據霍妮的理論,人格可分為「順從型」、「疏離型」以及「傲慢報復型」三類,他們在面對危機時,會分別採用「親近他人」「遠離他人」「敵視他人」三種策略(1990: 16),只有疏離型人格的人才會在「遠離他人」的想像時空中尋找庇護。比如,相較於同樣仕途受阻的李白和杜甫,只有陶淵明在想像的世界中建構出「人人勤勞耕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社會」(張隆溪 2008: 13)的烏托邦社會。原因在於,李白自信灑脫,常常採取敵視、報復他人策略進行自我防禦,且身邊不乏一群仰慕其才華的人,可與之把酒言歡;杜甫具有親近他人傾向,即便潦倒之際仍有親朋好友噓寒問暖,並為之雪中送炭;唯獨陶淵明,「自幼修習儒家經典,愛閑靜,念善事,抱孤念,愛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袁行霈 2003: 852-865),性格淡然而疏離,身邊亦無他人相伴左右,故而遁入烏托邦尋找慰藉。

據此,可以合理推斷,烏托邦的發生具有三個初始條件:現實環境造成個體缺乏安全感、個體存在疏離傾向、個體無法在現實中重獲安全感。因此,烏托邦者會在遠離現實的時空中重構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以此來補償現實中匱乏的安全感。

(二) 策略模組、建構模組、功能模組

圖式的序列性和系統性表明,情感驅動會引起個體的一連串反應。前文已經指出,烏托邦並非單純是個人的感性幻想,而是一個動態的理性的認知過程。理解烏托邦的初始條件(動機模組)之後,接下來便是理解烏托邦機制的應對過程,即策略模組、建構模組以及功能模組。一直以來,烏托邦都被認為是對處於另一時空美好社會的想像,也就是說,烏托邦的客體是處於另外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形態。烏托邦需要找尋一個適宜的時空,讓個體期望的舒適感合理地上演。時空作為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烏托邦的終極目標是寄寓在時空裏,能夠給烏托邦者帶來安全感與滿足感的生存狀態。

這樣一個期望效果的實現,首先需要借助疏離策略的實施,即考夫曼所說的烏托邦應當在「遙遠國度」(4)。之所以有如此定論,是因為疏離(distancing)一方面能夠讓現實因距離感而產生美,另一方面讓這種距離美免受現實侵擾與否定,從而使烏托邦以相對穩定的方式「獲得歷史假說的可能性」(Suvin 1973: 136)。因此,烏托邦者或者借助沉船遇險,或者借助夢遊奇境,或者借助冒險遊歷,將烏托邦的時空客體或置於過去,譬如,逝去的黃金時代,古神話中的伊甸園(《上帝之城》《來古格士傳》);或指向未來,譬如,想像的未來世俗生活(《烏有鄉消息》《回顧》);抑或是當下時代遠離現實的想像(《太陽城》《自由之鄉》《魯濱遜漂流記》《她鄉》)。需要注意的是,疏離作為烏托邦遠離現實的一種策略,並非意味著與現實斬斷聯繫。它雖疏離當下,但是卻與現實緊密相關;它是「一種基於『現在』,又超越『現在』的尚未『存在』(not yet)」(姚建斌 108)。比如,莫爾在描寫烏托邦的小島時,便緊緊模擬當時英國社會的結構,用赫茲勒的話來說,「烏托邦國的首都阿馬羅特與倫敦幾乎分毫不差,而生活卻與英國生活恰恰相反」(130)。

然而疏離策略僅僅為緩解當下不滿情感提供了一個逃離通道,並不能真正帶來積極情感,在現實中感

受到的不安全感並不會因為短暫的精神逃離而消失殆盡。烏托邦真正讓人津津樂道並充滿嚮往的，實則是其中與現實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生存狀態」。這樣一種想像的生活狀態，作為原則上在當下無法實現的一種理想，卻能夠給人帶來極大安全感。如此美好的想像的生存狀態依賴於另一策略的實施——理想化（idealization）。與現實世界相比，烏托邦作為理想化存在，不但能夠更好地適應人的本性與需求，還能夠更好地適應人未來可能的發展。

理想化策略的首要對象，便是疏離現實的烏托邦時空。只有當想像時空理想化時，現實中引發不安全感的某種存在才能夠合理地消失；與此同時，現實中難以存在的某種特性才能夠平安地存在。可以看到，烏托邦的理想時空或置於海上小島，或置於幽僻山谷，或置於恬靜田園，既展現為不再有惡存在的猶太教伊甸園、基督教式天堂，也展現為田園牧歌式懷舊家園、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城市，還展現為世俗利益共同體、AI 與人的命運共同體。儘管烏托邦的想像時空形式多樣，但將它們與烏托邦的當下環境置於二元對立的模式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到，烏托邦的理想時空存在著共性。一言以蔽之，烏托邦者的當下環境常常「混亂、不公、無序、充斥著變動、矛盾與痛苦」，而理想化的烏托邦時空往往「自由、平等、有序、安定、簡單、團結、穩定、充滿快樂」（Sargent 1994: 6）。不難理解，現實讓人產生不滿與焦慮之感，並有逃離處境的衝動，而烏托邦時空作為對現實的一種逃避和重構，只有作為一種有序、公正並穩定的精神家園，才能夠使個體在現實中因環境不利而萌生的不安全感得到有效緩解。可以說，以穩定、團結、有序為主要特徵，並能夠緩解個體不安全感的時空是建構烏托邦的基石。為了達到這一效果，烏托邦者常常根據自己目前的精神傾向、情緒以及信仰解構，從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宗教、教育等方面建構自己的理想狀態。因而，可以看到，烏托邦的理想時空中既有自由散漫的無政府主義，也有高度集中的共產主義；既出現對財富公有制的高歌，也出現對財富私有制的維護；既存在堅定的社會等級制，也存在絕對的平等博愛制；既可以注重教育的普及，也可以傾向教育的平庸。比如，在莫裏斯的《烏有鄉消息》中，「這片人間樂土沒有私有財產，交易不用貨幣，貧富的界限已經消失，人人熱愛勞動，人人有工作。在這裏，壓迫現象已經消滅，人們獲得了完全的自由。作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的『專制政治的機器人』的資產階級政府，都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2017: 6）；反觀赫茨爾筆下的《自由之鄉》，在這個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之上的共同富裕的世界裏，雖然人人平等而自由，卻依然受政府機構的管轄，私有制不但沒有被廢除，反而被視為刺激勞動的最好因素而被大力推行。

對理想化時空的建構，旨在幫助個體獲得安全感與滿足感。馬斯洛的層次需求表明，除了維持自身生存、保護自身安全這兩個基本需求，人的滿足感與安全感還與感情、尊重以及自我實現息息相關，因此，對於烏托邦遠離現實的理想時空而言，除卻能夠滿足最基本生理與安全需求的物質環境，時空中所包含的其他元素同樣重要。換句話說，烏托邦之所以美好，不僅僅源於遠離現實的理想時空中物質生活的簡單、有序與滿足，還與在這樣一個時空下構成人精神狀態的元素密切相關。芒福德在分析烏托邦時，便運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將烏托邦這兩個方面區分開來，他說，「所有真正的烏托邦人都想創造的重建環境，既有物質世界，也有精神世界」（12）。進一步說，烏托邦的理想建構並不局限於對物質世界的建構，「還有對習慣、價值觀、價值標準、人際關係」（12）的重建。誠然，在烏托邦理想化的時空中，人際關係與其背後的價值觀念，是烏托邦的精華所在。雖然烏托邦高度情境化使得「人際關係」與「價值理念」並無固定的形式和內涵，但是卻有一定的規律可循。

卡夫曼用「簡單、快樂」（3）對烏托邦中建構的精神世界做了概括。就烏托邦時空裏的人際關係來看，人與人可以是主從型等級關係，也可以是合作型平等關係；人與人之間可以密不可分，也可以鬆散疏離；就價值理念而言，可以強調公平，也可以強調自由；可以強調秩序，也可以強調情感；但總體的狀態是有序與和諧。例如，《魯濱遜漂流記》中，笛福通過想像一個微觀上友愛互助，宏觀上秩序分明的小島，構建了「英國白人」與「土著人」之間理想的等級與倫理關係，其中蘊涵著作者理想的價值理念，即：一方面希望有和諧、包容



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希望有著和諧、溫情的倫理關係，強者要包容和關愛弱者；相比之下，莫裏斯在《烏有鄉消息》中建構的理想社會關係與價值理念則相對簡單——人與人之間沒有等級劃分，沒有優劣高低；平等與自由是第一法則。同樣，《老子》與《列子》中雖然分別想像了兩個不同的國度——「小國寡民」與「華胥國」，但都建構了一種鬆散的人際關係與自由的價值理念，前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後者「不知親己[……]無所愛惜」；與之相反，《她鄉》通過勾勒一幅「自信十足、意念堅定」(2003: 23)的女性群像，建構了一種具有牢固人際關係的女性共同體，並傳達出作者理想的價值理念，即：女性享有與男性同等尊重、平等的社會地位，在此基礎上，女性之間親密有愛，兩性之間包容和諧。

人際關係及價值理念通常和身份問題密切相關，這在烏托邦建構中也不例外。正如夏皮羅(Daniel L. Shapiro)所說，「我們總是將自己置於與他人的關係之中，然後按照對這些關係的認知來定義自己」，烏托邦中的個體以「另一種方式生存、思考與活動」(Sargisson 2000: 1)，「身處其中與現實中截然不同」(Moylan 1986: 10)。然而烏托邦中的身份問題具有特殊性，其一，具有更宏觀層面的象徵意義，相較於個體身份，烏托邦身份的重心在以性別、階級、種族、民族乃至國家為核心的集體身份；其二，烏托邦中的身份認同依賴於理想時空中的自我與「重要他人」之間平等的相互承認，而不是借助傳統二元對立模式中「自我」與「他者」鬥爭狀態下的不平等關係(Sargisson 2000: 4)。不難理解，因為有著更為敏銳的目光和更深刻的人文關懷，烏托邦者能夠對社會肌理進行更細緻入微的觀察；又因為有著更加高尚的道德標準和更悲天憫人的胸懷，烏托邦者可以對更好的生活狀態展開構想。用赫茨勒的話說，烏托邦者既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又是超越他們那個時代的人；他們代表著那個時代社會問題的最先進思想，引導著人們向前向上(259)。比如，吉爾曼的《她鄉》中少見勾心鬥角的他者，常見能夠給予關愛與幫助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②；較之於個體身份，作為整體的女性身份才是關鍵。因此，小說建構了導師索瑪與妻子依拉朵這兩個「重要他人」，通過她們給予主人公範戴克關愛與包容，吉爾曼構建了與傳統社會中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份——平等而獨立，並享有男性的尊重與愛戴。而在《魯濱遜漂流記》中，通過想像「英國白人」與「土著人」之間等級與倫理關係，笛福更大程度上建構了一種懷舊式英帝國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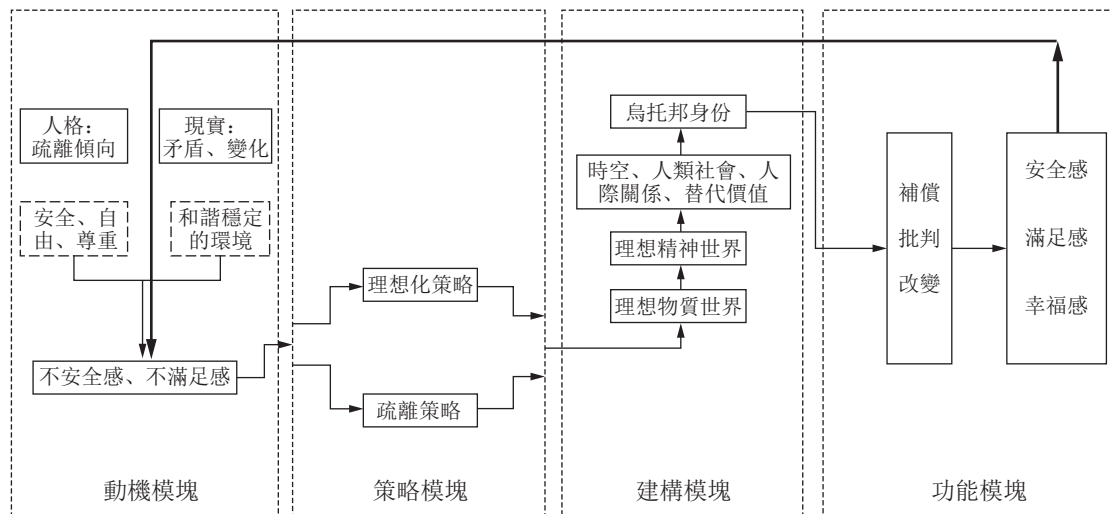
必須指出，無論是遠離現實的疏離、理想化策略，還是想像空間中的認知建構，都指向烏托邦的功能性。對於烏托邦所具有的補償、批判與改變功能，學界已有相對一致的定論，前文也已詳細指出，故不做贅述。總結來看，我們可以對烏托邦的源起和性質做一個新的界定：烏托邦是個體在當下環境另自我感受到危機而產生不滿足與不安全感的情況下，衍生出來的一種適應性機制。烏托邦的核心是在象徵性的理想時空中建構理想化的生存狀態，從而為消除當下不滿與不安全感提供一種可能。

(三) 烏托邦的圖式模型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明確烏托邦所具有的圖式性。為了更加直觀清晰地展現它的內在結構，我們可以將烏托邦的圖式模型抽象出來，具體如下圖。

可以看到，烏托邦認知圖式始發於具有疏離人格傾向的個體遭遇現實的矛盾與變化，因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獲得足夠多的安全感，他們會萌生出與不安全感與不滿足感。對此，他們通常採取疏離和理想化策略，在遠離當下的時空中進行認知建構。這種認知建構既包含以「有序、安定、快樂」為特徵的物質世界，也包含以「簡單、快樂」為特徵的精神世界，最終使一種有別於現實生活中受到潛在威脅的烏托邦身份成為可能。這一系列認知建構既批判了當下現實，又補償了情感缺失，甚至對改變現實有一定作用，它給個體帶來了安全感、滿足感以及幸福感。

以上相關烏托邦的模型僅僅勾勒出烏托邦認知機制最典型的、具有共性的過程，烏托邦者的處境、經驗以及與現實話語博弈的能力決定了烏托邦的現實樣貌比該抽象模型要複雜得多。古斯萊曾說，「柏拉圖心



目中有一個較一般的抽象目的,他力圖闡明抽象的正義,莫爾則對眼前的實際社會問題感興趣,並忙於制定計畫以緩和現存的不幸局面」(127),的確,烏托邦建構在不同時期、因不同人物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因而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形態。前文已表明,就烏托邦的理想時空而言,其樣貌千姿百態:既有原始宗教伊甸園、不為人知的世外桃源、各類兄弟/姐妹共同體,也有田園牧歌式懷舊家園;就「人際關係」及「價值理念」而言,可以是自由的平等關係;也可以是有序的等級關係,前一類型常常見諸於等級社會和集體主義文化的烏托邦敘事中;而後一類型則出現在現代的、個人主義的敘事中。由於等級社會的鴻溝,缺乏安全感的烏托邦者常常寄希望於一個自由和諧的社會,而個人主義的發展使烏托邦者傾向於有序的等級。然而,無論建構何種理想的社會關係與價值理念,它們最終指向的是補償個體在現實環境中產生的不安全感,進而重新審視生命價值。

正如學者所言,現實世界是一個複雜的連續體,相鄰事物之間並不存在永恆不變的界限,越是複雜現象越容易產生含混,也越需要仔細辨別(戚濤 101)。對於烏托邦認知圖式而言,最容易造成混淆的便是理想化這一重要因素。因個體的思維模式差異,理想化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烏托邦現象易與眾多文學、文化現象產生混淆,包括種族主義、極權主義、共同體等等;另一方面,因實踐方式紛繁複雜,烏托邦改變現實的功能作用導致的結果可能與預期產生偏差,烏托邦也容易遭到誤解與攻訐,典型代表便是反烏托邦現象的流行。因此,為了更加清晰且深入地理解烏托邦認知圖式,我們有必要厘清其界限所在,並對最容易出現混淆以及產生誤解的現象作出區分與辨析。

三、烏托邦認知圖式的界限

在對烏托邦圖式進行辨析時,首先需要甄別的是懷舊這一現象。同樣作為認知圖式,懷舊與烏托邦存在很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個體在不利環境下衍生的自適應系統,都始發於環境影響下個體情感的缺失,都青睞於借助疏離與理想化策略在遠離現實的理想時空中建構能夠帶來情感補償的替代價值;此外,烏托邦建構有時帶有懷舊成分,懷舊建構有時也帶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因此,可以說,二者是極為相近的圖式。然而,兩種圖式因始發條件(動機模組)不同,建構重心自然不同,遑論功能與效果。具體來說,懷舊者存在「親近他人」的秉性,其疏離策略的目標在於「回歸他人」(戚濤 101),因而在認知建構中側重於理想化客體,即,「重要他人」與懷舊自我的紐帶;而烏托邦者因為具有疏離傾向,其疏離的目的在於追求「更好的自己」,因而認知建構始終以主體為核心,呈現出對主體所在的整體生活狀態的把握——既涵蓋物質世界(社

會),也涵蓋精神層面(重要他人)。因此,相較於懷舊,烏托邦的現實意義更強,改變現實的力量也更大,傳達的未來感也更強烈。比如,人們可以通過《追憶似水年華》感受到普魯斯特對沒落貴族階級及其昔日榮華的不勝惋惜,並在這部「趨於黃昏的悲哀之美」的挽歌中因感同身受而頹廢傷感,但卻很難有改變社會,恢復貴族生活的衝動;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以及莫爾的《烏托邦》,都能讓人們在相關一種無苛政無重斂、人人平等自由而安居樂業的想像生活中怡然自得,同時為之努力奮鬥,推動社會朝之發展。

至於容易混淆的共同體現象,理論上說,它與烏托邦之間存在天然的聯繫。二者都是對於理想生存狀態的構想,都是人類歸屬感需求的產物。烏托邦試圖建構的社會關係和價值理念也是共同體的構成要素,可以說,共同體是烏托邦認知建構的實踐之一。然而共同體並不等於烏托邦,因為現實中形式各異的共同體無所不在,只有在現實中尋覓不到,轉向於想像時空中建構精神共同體才是烏托邦。用薩金特的話來說,「烏托邦的本意便是不存在之地」,烏托邦中的共同體形式也只是「趨於共同體,但還不是共同體」(Sargent 16)。典型的例子便是《她鄉》,吉爾曼雖然構建了自由平等、和諧互助的女性共同體,但這種共同體因完全排除了男性的存在而具有極端理想色彩,在現實中難以尋覓,因此只能作為烏托邦式共同體想像,並不能等同於共同體。同樣,閻連科筆下的「受活莊」(《受活》),雖然呈現了一個殘疾人的天堂——在受活莊他們身懷異稟,豐衣足食,自由自在,甚至「圓全人」都甘願自殘換取進入其中的通行證。但這種與現實世界徹底斷裂的生存狀態過於理想化,因缺乏基於現世邏輯的可信度,也只能作為一種反諷性的烏托邦共同體想像。

將烏托邦等同於極權主義、種族主義的思想經由柏林(Isaiah Berlin)、阿倫特(Hannah Arendt)等著名思想家的作品得以風行,然而烏托邦與二者卻有著本質區別。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就曾明確指出,縱使極權主義與種族主義都無比清晰地表達了對未來強權的想像,且都是對尋找理想社會之旅的例證,但他們「不是基於烏托邦主義」(2007:23)。換句話說,他們不具有自赫西爾德到貝拉米以來的烏托邦主義的特徵,即「憧憬一個和平的世界[……]憧憬和諧、輕鬆、寧靜的共同生活」(21-23)。因而,無論希特勒為他發起的種族主義行動冠以何種理想主義色彩,這種以屠殺猶太人為代價的行為都不能歸為烏托邦範圍以內,因為它的殺戮性與破壞性從本質上就與烏托邦精神相悖。

這種本質區別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反烏托邦現象,並由此對烏托邦作出相應的圖式增加^③。通常,我們會將反烏托邦定義為「對烏托邦思想的拒斥」(王一平 2012: 203),認為它們以批駁傳統、正面的烏托邦想像為己任,呈現出對烏托邦的解構面貌。然而,這種論斷通常基於一個錯誤前提,即,將反烏托邦中的「烏托邦」等同於一切烏托邦構想進入實踐之後可能造就的黑暗世界,(比如,極權主義與種族主義),從而忽略了反烏托邦思想的烏托邦動機。不妨說,反烏托邦其實採取了一種陌生化的表達方式,通過對可能出現的不美好狀態的憂思,表達對美好的生存狀態的渴望。換句話說,反烏托邦並非反對進步、科學、理性等一切相關更美好世界的想像,而是反對這些美好想像在付諸實踐時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比如,「民主變成暴力和獨裁政治,科學和理性沒有幫助人類走向進步,理性變成了非理性」(王建香 2016: 10)。因此,反烏托邦通過對荒誕性與不現實性的警醒所展現出的生存焦慮與人文情懷,與烏托邦圖式的始發機制(動機模組)如出一轍。更進一步來說,如果烏托邦是通過理想化時空喚醒人們,那麼反烏托邦則是通過極端化時空警醒人們,從而實現改變現實的功能,二者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共同指向一種更好的生存狀態。以反烏托邦三部曲《美麗新世界》《1984》《我們》為例,這三部以批判「極權主義」而聞名的作品,背後傳達的對美好世界的渴望往往遭到忽視,然而這種渴望便是烏托邦動機所在。《美麗新世界》對極權主義掌控下的「文明世界」的鞭撻,實則是對反極權性質的「蠻族保留區」的謳歌;《1984》中的「黃金鄉」與「玻璃鎮紙」,顯然是烏托邦田園牧歌式家園的表徵;而《我們》中的「I-330 和 D-503」,作為頑強反抗極權統治的人類,無疑是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烏托邦者的典型代表。由此可見,反烏托邦中的「批判、諷刺功能與烏托邦的理想色彩相平衡」(Kumar 1987: 125),「雖然表現了人類對自身理性、科學、進步等觀念的深刻懷疑,但表達了作家強烈的生態焦慮,背

後其實是作家們的『烏托邦衝動』(歐榮 2020: 171-172)。

巴特利特指出,承載著知識資訊的圖式不是一個單一獨立的結構,它有很多變數,能夠拓展和延伸(1995: 200)。通過與懷舊、共同體、極權主義這三大相似現象以及反烏托邦這一看似對立現象的辨析,我們可以看到,既不能簡單地將懷舊、共同體、極權主義、種族主義等相近現象與烏托邦等同起來,也不能將烏托邦與看似與之對立的反烏托邦現象完全割裂。烏托邦圖式的複雜性與系統性決定我們要以更加開放的視角看待烏托邦。

四、結語

與 20 世紀反烏托邦文學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烏托邦作品的銷聲匿跡。顯然,兩次世界大戰的空前危機、史達林主義在蘇聯遭受的批判、歐美學生運動的失敗以及福利國家的困境,無不昭示著烏托邦時代正在走向衰落,哈貝馬斯稱之為「烏托邦力量的衰竭」(2003: 3)。保羅·蒂裏希(Paul Tilich)認為烏托邦的弱點在於它忽視了人類有限性的致命弱點,「預先假設了一個虛假的人的形象」(22),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擺動中淪為一種純粹的願望投射;曼海姆則指出,烏托邦「不能正確診斷現存的社會狀況,它不關注事物的真實存在,而是在思想中尋找改變現狀」(169);烏托邦追求的秩序等於團隊組織,自由等於制約,教育等於灌輸,滿足等於條件反射,新的社會規則等於極權主義,因此從神壇跌入地獄。

事實上,烏托邦並非如此,烏托邦的積極功效以及重大意義已經被不同思想家加以肯定。與法國小說家及評論家法朗士的觀點一致,荷蘭學者佈雷德曼(Rutger Bregman)也認為烏托邦不僅是一種有助於產生想像和希望之視野的載體,也是當下指導行為和探索價值觀的源泉,「沒有烏托邦,我們將失去方向」(19)。只是,烏托邦的當代語境使烏托邦背離了原本初衷,造成了烏托邦之死的假相。因此,回歸烏托邦,並重新定義烏托邦尤為必要。

借助認知圖式理論,對烏托邦進行重新闡釋,可以看到,烏托邦是一個後天習得、有著複雜的結構和無限開放性的自適應系統,它囊括著動機、策略、建構、功能四個模組,具有生成性、系統性、複雜性的特點。按照這一系統模型,烏托邦的生成源於人類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的互動:現實條件造成具有疏離傾向的個體產生強烈的不滿與不安;在此情況下,個體為擺脫這種情感,傾向於利用疏離、理想化策略,在遠離現實的象徵空間裏尋找滿足感與安適感。只是時代、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以及烏托邦者的博弈能力不同,烏托邦理想化建構的具體形式多種多樣。鑒於此,以一種開放性與綜合性的眼光重新審視烏托邦尤為必要。

注釋

- ① 圖式最早由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表明概念本身並無意義,只有與人們已知的事物相互聯繫時才具有意義。概念並非孤立地儲存在記憶中,而是相互聯繫,構成了反映現實中相互聯繫的事物的認知結構圖式。
- ②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簡言之就是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親人、友人、愛人、事業夥伴等。有學者認為,人們對身份的建構需要重要他人給予認可,缺乏這種認可極可能對身份造成傷害(Taylor 36)。
- ③ 圖式增加是指給現存的圖式中加入新資訊,從而擴大它的範圍和解釋域。

參考文獻

- ① 奧斯卡·王爾德:《謊言的衰落:王爾德藝術批評文選》,蕭易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
- ②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夢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
- ③ 赫西爾德:《工作與時日》,張竹明,蔣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 ④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 ⑤ 卡倫·霍妮:《我們內心的衝突》,王作虹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 ⑥ 拉塞爾·雅各比:《不完美的圖像: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姚建彬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 ⑦ 李小青:《永恆的追求與探索——英國烏托邦文學的嬗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
- ⑧ 劉易斯·芒福德:《烏托邦的故事》,梁本彬,王社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 ⑨ 魯斯·列維塔斯:《烏托邦之概念》,李廣益,範軼倫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
- ⑩ 魯特格爾·佈雷德曼:《理想主義者的烏托邦》,曾小楚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 ⑪ 歐榮:《文化觀念裂變時期的英國文學典籍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0年。
- ⑫ 戚濤:《懷舊》,《外國文學》,2020年第2期,頁88-101。
- ⑬ 喬·奧·赫茨勒:《烏托邦思想史》,張兆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 ⑭ 讓·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原理》,王憲鈿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
- ⑮ 邵志芳、高旭辰:《社會認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⑯ 王建香:《反烏托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 ⑰ 王一平:《論反烏托邦文學的幾個重大主題》,《求索》,2012年第1期,頁201-203。
- ⑱ 威廉·莫裏斯:《烏有鄉消息》,黃嘉德,包玉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⑲ 夏洛特·伯金斯·吉爾曼:《她鄉》,林淑琴,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
- ⑳ 姚建斌:《烏托邦小說:作為研究存在的藝術》,《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頁105-115。
- ㉑ 尤爾根·哈貝馬斯:《新的非了然性》,薛華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㉒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㉓ 張隆溪:《烏托邦:世俗理念與中國傳統》,《山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頁5-13。
- ㉔ 鄭春順:《混沌與和諧》,馬世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 ㉕ Barlett, F. Charles.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㉖ Beck, Aaron & Freeman, Arthur, et al. *Cognitive therap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4.
- ㉗ Davis, J. Colin.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A study of English utopian writing 1516-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㉘ Dupont, Victor. *L'Utopie et le roman utop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Librairie Didier, 1941.
- ㉙ Gerber, Richard. *Utopian fantasy: A study of English utopian fic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5.
- ㉚ Kaufmann, Moritz. *Utopias*. London: Kegan Paul, 1977.
- ㉛ Kumar, Krishan, *Utopia and anti 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㉜ Levitas, Ruth.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lip Allan, 1990.
- ㉝ Manuel, E. Frank &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on the western world*.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79.
- ㉞ Morton, A. Leslie. *The English utopia*.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2.
- ㉟ Moylan, Tom. *Demand the impossib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1986.
- ㊱ Sargent, T. Lyman. *British and American utopian literature 1516-1985*.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88: xiii. —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ian Studies*, 1994(5): 1-37.
- ㊲ Sargisson, Lucy. Green Utopias of self and other.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0(3): 140-156.
- ㊳ Shapiro, L. Daniel. Relational Identity Theory: A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Transforming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of Confli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0 (7): 634-645.
- ㊴ Suvin, Darko. Defining the Literary Genre of Utopia: Some Historical Semantics, Some Genealogy, A Proposal and A Plea.

-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1973(6): 121–145.
- ④ Taylor, Charles.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4.
- ④ Thagard, Paul. The cognitive–Affectiv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Emotion in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 Ed. Bilyana Marti- novski. Berlin: Springer, 2015.
- ④ Thomas Homer-Dixon and Jonathan Leader Maynard, et al. A Complex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deology: Cognitive–Affective Structures and the Dynamics of Belief System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3(3): 57–73.
- ④ Tillich, Paul. *The courage to be*. Cumberland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④ Zygmunt, Bauman.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 ④ SHI Xiaomei & ZHOU Yuxi. (2021).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news reports o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 68–77.
- ④ JIN Luobin. (2021).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s exemplifi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Shengsi pilao by Goldblat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 50–60.

(Editors: JIANG Qing & LENG Xueyuan)